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OVERCOM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东亚视角

EAST ASIA PERSPECTIVE

孙学工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OVERCOM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东亚视角

EAST ASIA PERSPECTIVE

孙学工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视角/孙学工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97 - 8626 - 0

I. ①跨… II. ①孙… III. ①经济发展 - 东亚 - 文集
IV. ①F1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9441 号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视角

著 者 / 孙学工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吴 敏

责任编辑 / 张 超 吴 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34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626 - 0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亚洲宏观经济论坛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发起举办的主要讨论东亚地区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的创立旨在为本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讨论和交流的平台，以便更好地为各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服务，进而促进本地区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内的协调与合作并提高本地区宏观经济决策的质量。前两届亚洲宏观经济论坛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1 年举办，已形成系列。

“第三届亚洲宏观经济论坛”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共同主办，主题为“中等收入陷阱与东亚经济转型”。本次论坛得到了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国的专家学者和官员积极响应和参与，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美国等国家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出席了本次论坛。此次论坛也得到国内各相关部门领导和学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都有代表参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到会并致辞。由财政部和外交部管理的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为论坛的召开提供了资助。对于来自国内外各方对亚洲宏观经济论坛的大力支持，作为会议组织方，我们深表谢意。

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中等收入陷阱与东亚经济转型”，出席本次论坛的与会学者深入研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与形成机制，回顾总结了东亚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东亚发展的新挑战，并探索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发展模式。本次论坛共提交大会发言论文12篇，交流论文16篇，为了使更多的学者和读者了解这一领域国内外研究情况，经会议组织方翻译编辑整理，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论文观点都为作者所有，并不代表作者工作单位和所在国政府。书中不妥与错误之处，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学工

2015年10月12日

目 录

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孙学工 / 001
一 前言	001
二 中国当前增长模式的特点	003
三 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	010
四 中国未来十年面临的主要挑战	015
五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017
六 结论	02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韩国为例	安忠荣 / 025
一 引言	025
二 促成韩国现代经济转型的因素	027
三 低水平高收入国家综合征	035
四 结论	036
东亚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和区域经济环境中	
面临的挑战	谢秀瑜 / 038
一 引言	038
二 全球增长转型和亚洲世纪	039
三 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和金融不稳定性	042
四 危机中的多边贸易体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 全球再平衡的需求	043
五 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竞争和粮食、能源、水资源安全	047
六 来自气候变化的环境风险和城镇化	051

七	东亚地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	052
八	东亚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案例	054
九	改善全球治理——IMF 和 G20	056
十	结论	058
东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武海明 / 060
一	引言	060
二	东盟社会经济不平衡的评估	061
三	原因及挑战	071
四	东盟国家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077
五	政策建议	084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企业发展		黄卫挺 / 090
一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观分析视角	091
二	日本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企业发展考察	097
三	中国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可能性	102
四	基于企业发展视角的对策建议	107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财政政策选择		
——基于国际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		刘方 / 112
一	研究背景	113
二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分析	116
三	财政政策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	125
四	实证分析	130
五	我国跨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财政政策	137
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曹玉瑾 / 153
一	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154
二	案例分析	157
三	对中国的启示	168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	刘志成 / 172
一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	172
二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75
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础	187
四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199
五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207
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新挑战	宋 泓 / 213
一 导言	213
二 出口战略与东亚经济发展	215
三 新国际经济环境下出口导向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220
四 出口导向战略转型	223
五 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向内地转移，向上升级还是 往外转移？	227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230
附录	234

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孙学工**

内容提要：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然而，中国通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仍然充斥着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新挑战。支持过去高增长的许多因素，如出口、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供应将开始产生相反的效果，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日趋紧张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约束。面对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要转向这种新的发展路径，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改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

一 前言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表现已经使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迈入中

* 本文为作者向“第三届亚洲宏观经济论坛”提交的英文论文中译稿。

** 孙学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高收入国家行列。从总量角度看，中国的成就更加出众。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而在三十年前，其经济规模尚不及西班牙。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体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贫困人口从2.5亿人下降到1400万人，贫困率则从30%下降到1%。

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或者按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乍看起来，这个目标似乎近在咫尺，只需要将其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继续向前延伸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未来10年继续保持目前的高增长水平，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对中国而言就近在咫尺。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可能很容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达到高收入水平。在二战后的历史中，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世界银行将这一现象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并指出过去带来成功的制度和经验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① 社会动荡和竞争力的丧失是中等收入国家在通往高收入国家道路上遭受失败的最常见原因。对于这些增长道路上的挑战，中国也不能幸免。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发现保持其高增长率变得越来越难。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政策反复刺激经济增长，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增长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运动，再加上不断变化的国内条件，可能会使中国偏离通向高收入国家的轨道。当前中国的增长模式，按照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讲就是具有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特点，可能难以实现其长期发展的任务。中国需要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并充分挖掘其增长潜力。面对新挑战，只有新的发展道路才可以确保中国能够在高收入国家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

^①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2012).

二 中国当前增长模式的特点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1980~2011年实现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快。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

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的增长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消费和投资在GDP中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经常账户大致平衡。1980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5.5%，2000年消费率为62.3%；1980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4.8%，2000年投资率为35.3%。净出口的份额波动保持在GDP的 $\pm 4\%$ 以内。在此期间经济主要是由消费增长带动。消费贡献了60%以上的增长，投资贡献了32%。第二阶段是2000~2009年，在此期间消费率发生明显的下降，投资和净出口相应上升。这段时间内，消费率下降了13.7个百分点，投资率上升了8.5个百分点。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积累，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上升了5.3%。有些人认为，中国过高的投资率和贸易顺差证明这段时期出现了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因此，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也就不足为奇。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5.5%和10.3%，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又一次发生转变。中国的出口在危机期间遭受重挫。2009年，出口下降了16%。危机过后，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复苏，但并没有回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其结果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萎缩，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下降至2.6%，大大低于2007年高峰期的8.8%。虽然外部失衡在危机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内部失衡仍然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剧。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从2008年的43.8%上升到2011年的49.2%。消费率则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从2008年的48.6%下降到

2011年的48.2%（见图1）。其结果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到60%，而净出口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此期间净出口的平均贡献率为-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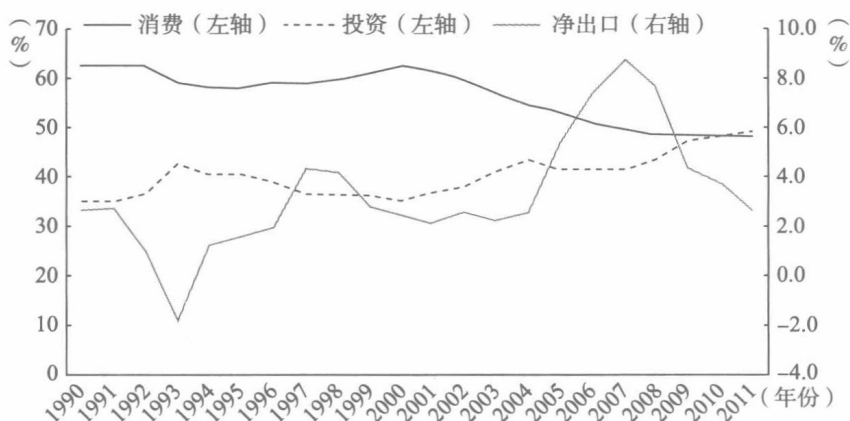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1年中国的GDP构成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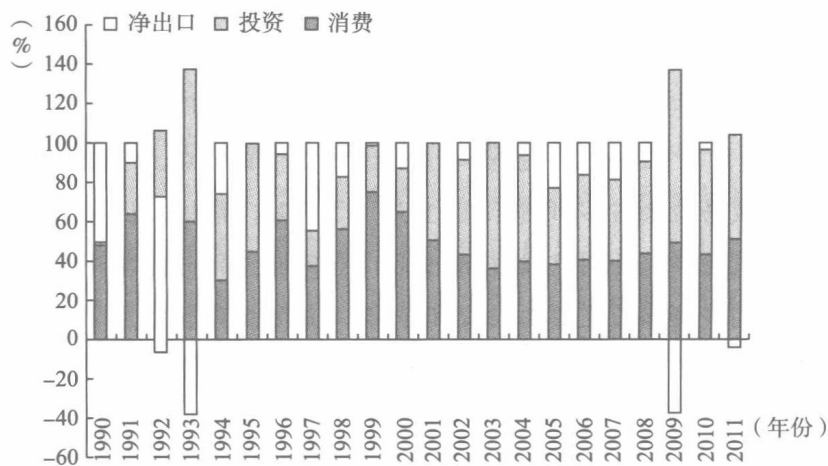


图2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总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年越来越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出口萎缩，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向投资倾斜。然而，对外部门的再平衡到底是暂时还是有持续性的仍然存在争论。一些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信中国的贸易盈余下降是暂时的，预

计 2017 年其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将回升至 4% ~ 4.5%。^①

(二) 国际经验意义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多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工业化驱动的投资率上升，中国也不例外。一项多国研究的结论表明，大多数国家在其收入水平上升的过程中其投资率都经历了倒 U 形的变化。^② 中国的东亚邻国，例如，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都经历了剧烈的结构变化。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正是中国超高的投资率。接近 50% 的投资率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见。中国的投资率不仅远高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国的亚洲邻国曾达到的最高水平。在投资高峰期，日本和韩国投资率分别只有 36.4% 和 38% (见表 1)。中国也经历了与日韩等国相一致的贸易顺差，并积累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外汇储备。^③

表 1 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国家或地区	中国	日本	美国	韩国	中国台湾	泰国	印尼	印度
投资/GDP								
2010 年	48.1	20.5	15.5	28.6	21.7	24.7	32.2	31.8
历史最高值	49.2	36.4	23.2	38	30.9	41.6	32.2	35.8
最高值年份	2011	1973	1943	1991	1975	1991	2010	2007
消费/GDP								
2010 年	34.9	58.6	70.6	52.5	58	53.7	56.7	61.9
历史最低值	34.9	52.3	49.5	49.1	47.2	53.2	56.7	61.7
最高值年份	2011	1970	1944	1988	1986	1995	2010	2009

资料来源：Fukumoto, T., and I. Muto,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me Insight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1 - E - 5, July 2011.

- ① Ahuja, A., N. Chalk, M. Nabar, P. N'Diaye and N. Porter, An end to China's Imbalances, IMF working paper WP/12/100, Washington, D. C. : IMF, 2012.
- ② 郭春丽：《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分析与监管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 ③ Fukumoto, T., and I. Muto,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me Insight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1 - E - 5, July 2011.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推动因素

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如此之高？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有人将其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另外一些人认为政策扭曲是主要原因。由于人们仍然难以定量判断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提供一个最佳的投资消费比例作为比较的基准，所以争论仍将继续。

那些相信经济基本面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的人认为，中国的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高，仅仅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已。中国的消费率前所未有的低，也是因为特殊的内外因素碰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剩余劳动力在许多方面塑造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高投资的显然是高回报率。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往往不是建立在创新及其带来的高附加值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之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投资回报，进而带来了高投资率。剩余劳动力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也是巨大的。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抑制了工资的增长，从2000年开始企业部门每年可以实现30%左右的利润增长，大大高于平均每年15%的工资增长率。^①因此，家庭部门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这也导致私人部门消费份额的萎缩。相应地，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总体储蓄率的上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IT技术的进步、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国恰好处于全球化最中心的位置。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化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市场准入壁垒，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提高了投资回报率。因此，高投资是高回报率的自然结果。全球化也是中国的高顺差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有较高的出口倾向。随着越来越多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迁往

^① Dew, E., G. Martin, J. Giese, and G. Zinna, "China's Changing Growth Pattern,"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1 (2011), 49-56.

中国，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大减少了贸易壁垒，加快了这一进程。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加速进入中国，在此期间贸易顺差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989年的3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480亿美元。大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而要进入服务业则面临更多的限制。^①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使企业有效利用全行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随着国外企业利用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以及中国邻近亚洲其他国家的优势，中国已经成为出口加工制造的中心。

虽然家庭储蓄上升并不是推动总储蓄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仍然偏高，2009年家庭储蓄占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30%。^②文化和人口等因素似乎是这背后的原因。东亚国家普遍存在节俭的传统。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储蓄往往排在世界前列。在中国，特别高的储蓄率与高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消费者的储蓄行为并没有像迅猛的经济增长那样出现变化，因为大多数消费者是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口因素也在推高储蓄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了，而这部分人因为正处于工作年龄，其消费更少而储蓄更多。

另外，一些评论者指责政策扭曲是中国经济失衡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有些人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投资的真正动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③为了吸引投资者和削弱其他地区的努力，许多地方政府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以及对投资者的补贴。地方政府本身也参与大型的投资项目，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所

① Long, G., "China's Policies on FDI: Review and Evaluation," in Moran, T. H., E. M. Graham, and M. Blomström, ed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pp. 315 - 336.

② Dew, E., G. Martin, J. Giese, and G. Zinna, "China's Changing Growth Pattern,"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1 (2011): 49 - 56.

③ Cheung, S. N. 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ong Kong: Arcadia Press Ltd, 2008).

有这些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高增长。

被压抑的要素价格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投资的一种补贴。除了众多的其他因素外，土地、能源、资金的价格和污染的成本也明显被压抑。较低的土地价格和污染成本通常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继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能源价格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政策，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该机制在能源价格与投入品价格和国际能源价格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一机制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如果它与其他政策目标，如稳定价格总水平存在冲突，那么该机制的实施就会受到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国的能源价格仍然低于均衡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能源生产和使用造成的环境破坏。资金成本也因为金融压抑而被人为地压低。政府对支付给储户的利率实施监管，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下应有的利率水平。较低的资金成本，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因素。

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的“三座大山”，即教育、养老和医疗的压力，这些压力是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的，^① 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国有企业和农村改革中被废除，但直到最近，新的社会福利体系仍未完全建立。

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一直在实施促进出口增长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引导相关资源进入出口部门。然而，一些人认为中国未能在生产力迅速上升的过程中成功地调整其政策，导致贸易顺差持续积累。例如，尽管2005年和2009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但按照真实的贸易加权率，它仍然保持在2001年左右的水平。通过提升外国商品的国内价格，降低国内商品的国外售价，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趋向于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改变内需的构成。^②

（四）当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不管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广泛关注过

① Blanchard, O. and F. Giavazzi,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4 (2006): 1–20.

② Dew, E., G. Martin, J. Giese, and G. Zinna, “China’s Changing Growth Pattern,”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1 (2011): 49–56

高的投资率以及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

首先，高投资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低效投资，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质疑。如果需求不能跟上产能的快速扩张，高投资的结果将是经济增长停滞。毫不奇怪，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和化学品等行业正在经历严重的增速下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该行业是近年来实施了大规模投资的领域之一。高投资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还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特别是当投资是由政府主导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政府主导投资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过度投资不仅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还可能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曾警告中国：“令人担忧的是，它（过度投资）比亚洲其他国家的过度投资规模更大且更持久，也比日本1980年代的过度投资规模更大且更持久，而前者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后者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源。在这些过度投资之后，都现出了持久的增长和投资下滑。”

其次，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外部失衡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在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Astley等认为，在危机之前，资金错配和风险低估，进而导致全球经济产生重大漏洞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从顺差国向逆差国的流动。减少全球失衡，同时推动金融部门的改革，将有助于防止未来这种漏洞再次出现。^①

最后，中国的高投资和不寻常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反映消费支出比例相对较低，表明中国的家庭部门并没有得益于增长数据所显示的巨大经济发展。再加上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公平正义已经受到质疑。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低于亚洲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中国外部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① Astley, M, J. Giese, M. Hume, and C. Kubelec,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3 (2009): 178 - 190.